

# 澳門佛教界的愛國傳統及對佛教文化的傳承

宋漢曉 譚經宇

**[摘要]** 澳門佛教界具有悠久的愛國傳統。自明末清初以來，澳門佛教界與祖國內地法脈相傳、慧義傳燈。其遺民愛國色彩、追求革新圖存的進取精神、高度的抗日愛國覺悟，以及回歸後的“愛國愛澳愛教”思想，可謂一脈相承。澳門佛教界在傳教弘法的同時，又擔負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責任。正是澳門佛教界的這種堅守和傳承才使中華佛教文化在澳門發揚光大，深受信眾歡迎。澳門佛教界作為愛國愛澳的主要力量，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發揮了特殊作用。

**[關鍵詞]** 澳門 佛教 愛國 文化

## 一、前言

澳門的佛教文化與祖國內地具有相同的法脈源流。歷史上，澳門屬於廣東省香山縣管轄，而香山縣佛教的歷史可追溯至唐朝咸通初年，“時有真教在該地區傳教”，<sup>①</sup>真教即法果禪師曾從外地到香山弘揚佛法。明末以前香山縣佛教文化的不斷傳播和擴展，對澳門的佛教文化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明末清初，澳門佛教文化表現出鮮明的遺民愛國色彩；清末民初，內地佛教革新圖存的主張深刻影響着澳門佛教的進步；抗日戰爭期間，澳門佛教界人士表現出高度的愛國覺悟；為迎接回歸，澳門佛教界舉辦多種形式的慶祝活動祈求人民安居樂業。隨着澳門回歸祖國，澳門與內地佛教界的交往更加頻繁，“愛國愛澳愛教”深入人心。澳門回歸以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百姓富裕，至今法脈興隆、傳燈不息，中華佛教文化深深影響並烙印在澳門居民的心中。

## 二、明末清初澳門僧人鮮明的遺民愛國色彩

明末清初政權更迭、社會思潮湧動，禪宗在嶺南的傳播開創了新的局面。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大量明遺民出家為僧，遺民逃禪成為當時的一股潮流，尤以曾經有激烈的抗清運動的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最為盛行。在遺民浪潮的洶湧推動下，嶺南叢林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這個時候，嶺南的叢林成為抗清志士們的最佳避居之地，大量的遺民

**作者簡介：**宋漢曉，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生；譚經宇，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生。

<sup>①</sup>菩提心水：〈澳門佛教及其信仰特點〉，《法音》（北京），第12期，1999年，頁22。

僧隱居在這些寺廟僧舍裏面。這些遺民僧大都接受過傳統的儒學熏陶，吟詩作畫，極具藝術才能。同時，他們又堅守儒家倫理規範。在他們看來，皈依佛門不是避世，而是另外一種敦尚節義的歸隱。正是這些具有文人雅士風範遺民僧的融入，無疑為清初的嶺南佛門帶來了新氣象、新風貌、新變化，這種煥然一新的景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明顯改變了佛教內部固有的僧侶結構，導致了宗派風格的演變。曹洞宗以明顯優勢超出臨濟宗成為嶺南影響最為強大的宗派。澳門因其環境特殊，成為明末遺民活動的重要根據地。“正是明末清初的遺民僧，掀起了澳門佛教的第一次高潮”。<sup>①</sup>因內地反清復明遺民僧的到來，使這一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表現出鮮明的遺民愛國色彩。

遺民僧中具有代表性的曹洞宗壽昌系僧人石濂大汕（1633 — 1705），對澳門佛教影響很大。大汕俗姓徐，字石濂，號大汕，別號石頭陀，“清浙西人。博雅恢奇，凡星象、律曆、衍射、理數、篆隸、丹青之屬，無有不會，而尤長於詩。明季清人入帝中國，濂義不肯臣，乃拜辭老母，剃髮投禪，杖錫雲遊。凡山川名勝，足跡幾遍”。<sup>②</sup>石濂大汕拜覺浪道盛門下，尊覺浪定為曹洞宗第二十八世。覺浪道盛（1592 — 1659）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高僧也是遺民領袖。作為道盛的嗣法弟子，石濂和道盛一樣是一名具有強烈的抗清思想的愛國僧人。

從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大汕和尚繪製的《墨竹圖》中可以看出他心中強烈的反清意志。大汕筆下的竹子，墨色濃厚，風格高雅，主幹剛直，竹葉如劍，任憑風吹雨打巍然不動，屹立不倒，表現出堅貞不屈的氣節。姜伯勤將“大汕定義為得道高僧，塑造其德高望重的宗教形象和壯懷激烈的遺民形象”。<sup>③</sup>在明清交替之際，具有抗清思想的大汕無疑具有進步意義。

康熙三十四年（1695），大汕和尚應越南國王阮福週的邀請，赴越南順化、會安兩地講經弘法，受到當地王公大臣和貴族民眾的尊重，被信眾尊為“國師”。1698年，大汕回程經過澳門，將越南籌得的巨資，用於觀音堂的擴建，並委派徒孫循智和尚為禪院首任住持，負責擴建工作。這是普濟禪院歷史上第一次大型重修擴建，由此形成相當的規模。觀音堂從此將大汕和尚尊為開山祖師，沿襲組庭廣州長壽寺曹洞宗法脈，以“普濟禪院”之名奉行六祖禪宗。大汕和尚通過從越南帶回的巨資重修擴建澳門普濟禪院，為佛教在澳門地區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進一步提升了普濟禪院的中華文化質素。

重修後的普濟禪院，不僅完整地保留了中國傳統寺院的整體風格，還為明末清初像大汕一樣的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雅士提供了容身之處，成為堅守和延續中國文化的重要陣地。17世紀末的澳門，西方教堂林立，中西文化交錯，悠久的中華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巨大的挑戰。“在這個時候，大汕重修普濟禪院，尤如樹起了一座中華文明的豐碑，

<sup>①</sup>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第4期，1999年，頁43。

<sup>②</sup>黨曉龍：〈明末清初曹洞宗壽昌派詩僧的域外弘傳與詩歌創作——石濂大汕《海外紀事》探微〉，《人文論叢》（北京），第2期，2019年，頁211。

<sup>③</sup>黨曉龍：〈明末清初曹洞宗壽昌派詩僧的域外弘傳與詩歌創作——石濂大汕《海外紀事》探微〉，《人文論叢》（北京），第2期，2019年，頁210。

對於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sup>①</sup>

受嶺南佛教的影響，大汕不忍忘世的情懷和俗世化傾向成為他禪宗思想明顯的特徵，表現出他在清初對思念故國及抗清思想的關注。同時主張三教合一理念，並積極推進禪淨融合理論與實踐。“晚明以來佛教入世化傾向愈發明顯，大汕雖然渡越弘揚禪學，仍舊體現出關心時局、補益時政的強烈熱情，展示出叢林宗師慈悲精進的入世情懷”。<sup>②</sup>他有着清醒的民族文化意識，充分利用佛教對抗天主教東來的影響，正是他堅持守護並傳承中國佛教法脈，積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因此也奠定了他在普濟禪院及澳門佛教界的崇高地位，被尊為“洞宗第二十九世開建長壽飛來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圖1）。<sup>③</sup>

圖1 行腳圖



圖片來源：〔清〕釋大汕繪《行腳圖》，載《離六堂集》，國家圖書館藏本。

“跡刪成鷺，亦遺民而皈依於佛法者”。<sup>④</sup>跡刪（1637 – 1722），俗姓方，名成鷺，原名顛愷，號東樵山人，廣東番禺人。南明時補諸生，清朝攻佔廣東後，在廣州的華林寺削髮為僧，後於肇慶的鼎湖山主法。康熙二十九年（1690）跡刪遷隱至香山縣，並在香山城東高氏園林效仿東林黨結社於此，當時入社者達三十餘人，且為時名流。“成鷺的遺民性格表現為‘初以任俠自許’”。<sup>⑤</sup>1682年，時年46歲的成鷺南渡赴海南，曾到達會同、樂會、萬州、陵水等地。又於1684年返回禪城佛山。1690年任佛山仁壽寺書記。因成鷺海南之行，鄧之誠先生推證其參與反清復明之秘密工作。“故成鷺往澳門主普濟禪院。又

<sup>①</sup>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第4期，1999年，頁44 – 45。

<sup>②</sup> 黨曉龍：〈明末清初曹洞宗壽昌派詩僧的域外弘傳與詩歌創作——石濂大汕《海外紀事》探微〉，《人文論叢》（北京），第2期，2019年，頁212。

<sup>③</sup>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頁17。

<sup>④</sup> 馬國維：《明季粵高僧傳·前序》，《廣東文徵續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215。

<sup>⑤</sup>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頁485。

嘗渡海至瓊州。蹤跡突兀，實有所圖”。<sup>①</sup>此所圖便是指其抗清之事，即利用澳門普濟禪院為據點進行秘密反清活動。

作為一名出色的詩人，被譽為“詩僧第一”<sup>②</sup>的跡刪曾於1692、1697年兩度寓居澳門普濟禪院，以詩言志，以詩交友，寫下了與普濟禪院相關或與僧人交往的大量詩作如：〈遊澳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丁丑夏客澳門普濟禪院贈劍平師〉等。從〈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詩句：“但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報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出來學駝音。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閑身縱步吟。”<sup>③</sup>不難看出，跡刪雖寓居澳門，隱身禪院，卻暗示了他仍然關心東林黨人的復明運動。也“說明當時澳門普濟禪院為與跡刪在香山鐵城所開東林社諸子之遙相唱和之地”，<sup>④</sup>反映出那個時代遺民僧的抗爭精神，更是寄託了亡國之思。不難看出，成鷺雖身在澳門，但心底依然懷想香山東林諸子。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初年以“晚清遺老”自居的汪兆鏞寓居澳門期間曾以詩追古，以詩言志：“望廈訪禪林，澳剎斯最古。懿哉跡刪師，結夏靜揮塵。沿逮嘉道間，風雅亦萍聚。晚近何凋零，落葉冷秋雨。試繹法身言，皈依思淨土。”<sup>⑤</sup>通過紀念跡刪來表達自己遺老多少的悲愴情懷。

17世紀中葉，澳門以其特殊的地理和社會環境，使其成為一批以遺民自處的明末文人墨客的避風塘，通過幽居之地避難，圖他日東山再起。以大汕和尚為先導，先後吸引了跡刪、張穆、翁山、澹歸、獨漉等人前來駐足，並留下了大量詩文，從而使普濟禪院“成為澳門文學最早的發祥地”。<sup>⑥</sup>時至今日，在普濟禪院中仍存有跡刪的草書書法屏條、澹歸和尚的行書書法屏條、黎簡的行書對聯和隸書中堂、天然函罡的行書詩軸、陳恭尹的詩幅及羅岸先《米南宮拜石圖》畫作等等。普濟禪院之所以被稱為三百多年中澳門保存和展示中華文化最為豐富的寶庫，大汕可謂功不可沒。同時“也與大汕的追求新的生命的精神分不開，更與大汕在南海地區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分不開”。<sup>⑦</sup>普濟禪院為近代澳門文化史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 三、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後內地佛教文化對澳門的影響

自清末至民初以來，中華民族遭遇空前危機、外來文化的衝擊，也促使當時具有時代責任感的佛門代表人士自覺地提出革新圖存的主張，在佛教界掀起一波自我革新運動，大大推動了佛教的復興步伐。這股革新的風氣也影響到了澳門。戊戌變法時期，澳門是維新

<sup>①</sup>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95。

<sup>②</sup>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95。

<sup>③</sup>毅剛：《澳門四百年詩選》，澳門：澳門出版社，1990年，頁9。

<sup>④</sup>姜伯勤：〈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13、14期合輯，1993年，頁131。

<sup>⑤</sup>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頁439。

<sup>⑥</sup>劉登翰：〈分流與整合：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視野〉，《文學評論》（北京），第4期，2001年，頁42。

<sup>⑦</sup>姜伯勤：〈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誌》（澳門），總第13、14期合輯，1993年，頁131。

派人士重要的活動陣地，他們在澳門創設圖書館、學舍等，還成立了戒婦女纏足會、戒鴉片會及閱書報社等社團組織，<sup>①</sup>為喚醒民眾的愛國情懷，提升民眾的社會文化素養，他們積極開展了各種救國救民的活動。隨之而來的辛亥革命思潮席捲，社會亟待革新，民眾崇尚進步。受革命思想影響，佛教界也隨之奮起清醒，有識之士積極推動佛教改革，革新舊制，欲振興佛教文化。來自內地的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及佛教制度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影響着澳門佛教的進步和發展。

作為虛雲大師（1840－1959）的高足，澳門功德林觀本法師（1868－1945）是著名的高僧和佛學家，在澳門乃至中國佛教界都有着巨大的影響。觀本，廣東香山縣人，俗姓張壽波，號玉濤，家庭殷實，一生充滿傳奇色彩。1891年，他24歲時以鄉試第七名中前清舉人。1895年，他曾追隨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參加公車上書。1897年5月，他參與康廣仁與何廷光等人發起成立澳門不纏足會，以回應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纏足會。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張玉濤遂與康、梁等一起出走日本。在完成學業之餘，他還在當地積極推廣和開展華人教育，擔任橫濱大同學校校長並繼續從事興邦愛國活動。“張玉濤在1897年－1900年間在澳門、香港積極參與了維新派與革命派以及日本來華志士宮崎寅藏（滔天）、孫中山等人的秘密聯絡與會議等活動”。<sup>②</sup>

由於時局不安，屢遇挫折，經歷重重變遷，常覺人生如幻，深感世事無常，遂皈依佛門潛心佛學。1914年，張壽波皈依於江蘇常州天寧寺冶開法師門下，法號“觀本”並專修淨土法門。1915年，觀本與家人搬到澳門生活，為母親等人修“淨土”之便，建立功德林前身張氏家族念佛道場，開澳門近代家庭念佛道場之先河，積極開展講學活動。<sup>③</sup>清朝末年，澳門不少有識之士已經開始關注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維新派人士在澳門積極推動廢除婦女纏足的習慣，開辦寺院支持女子就讀。張壽波也期望通過佛學教育推動社會進步，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功德林寺院的創立是具有開拓性意義的舉措”。<sup>④</sup>

內地佛教改革風氣傳入澳門，是從常州天寧寺冶開法師應觀本之邀，於1918年至其創辦的澳門佛聲社弘法開始的。“觀本將近代大陸佛教復興運動的許多新經驗傳播到澳門，給澳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sup>⑤</sup>當時內地新式學佛機構居士林、講習所等如火如荼正在興起，此時身居澳門的觀本法師便借鑑內地的模式率先設立佛聲社，並於1923年將澳門故居的念佛道場改為無量壽功德林。“本林原香山居士觀本張氏弟昆仿古人藍田山莊，為奉母念佛經行次處。繼以機緣漸熟，隨喜者眾，乃擴拓道場，莊嚴佛殿，遂成今日規模。其址在澳門三巴仔街門牌十三號，及三層樓上街門牌十四號。自民國十二年，南海簡濟善堂弟昆出而為功德主，布金買地，向葡國官廳立案，永為女眾清修之所，定名曰

<sup>①</sup>楊開荊：〈澳門功德林寺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中國檔案》（北京），第6期，2023年，頁3。

<sup>②</sup>譚世寶：〈澳門功德林觀本法師（張壽波）史事鉤沉正補——兼正《虛雲和尚年譜》（增訂本）等文獻的有關錯誤〉，《文化雜誌》（澳門），總第95期，2015年，頁178。

<sup>③</sup>白照杰、栗翔宇：〈澳門功德林與“她”的世界記憶〉，《中國民族報》（北京），2023年7月7日，頁8，<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3070754-1.htm>，2024年5月10日讀取。

<sup>④</sup>楊開荊：〈澳門功德林寺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中國檔案》（北京），第6期，2023年，頁3。

<sup>⑤</sup>何建明：〈近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世界宗教研究》（北京），第4期，1999年，頁31。

無量壽功德林”。<sup>①</sup>觀本創辦功德林的目的，一是為仿造當時正值內地頗為流行的佛教居士林組織，二是試圖繼承和發揚明末清初在粵澳弘法的著名高僧跡刪的佛教文化傳統。這一改革和創新對當時內地和澳門的佛教界、文化界帶來了新的氣象，產生了更加積極的影響。

1924年，作為主要發起人，觀本法師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照南、簡玉階兩兄弟、觀健法師、何張蓮覺居士等各方人士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下，又將功德林改組為慈善女修院。慈善女修院成為澳門歷史上第一座面向社會的佛教女眾修道場，因此在澳門佛教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慈善女修院成立後，專門邀請上海靈山寺朝林大師掛臨濟鐘板。掛臨濟鐘板使這家原本以淨土念佛法門為旨歸的寺廟，同時獲得禪宗臨濟的血脈，從此禪淨雙修的傳統在這所寺院傳承不斷。1926年1月1日，功德林設水陸道場，標誌着功德林的正式成立。在觀本法師等人的推動下，澳門佛教界也緊跟時代步伐，深受內地佛教文化的影響，主動求變，出現了新的景象，發生了新的變化。觀本法師“對於澳門近代形態的淨土和禪佛教的發展，以及澳門近代形態的居士佛教、特別是女眾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直至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sup>②</sup>

1926年，首開嶺南女眾佛學院之先河的功德林女子佛學院成立。很快吸引港澳地區數十名女性入學修佛。在張蓮覺居士的大力支持下，觀本又根據內地興起並通行的佛學院模式，在功德林組織女子佛學教育。張蓮覺居士（1875—1938），廣東新安人，為香港大富翁何東爵士之妻。全家除她外都信基督教，只有她在民國初年因為慧業善根，崇敬三寶，探究真理，最終皈依佛門。<sup>③</sup>1929年底，在張蓮覺居士的努力下，澳門女子佛學社和女子義務學校在功德林設立。因為以修淨業為主，澳門女子佛學社又稱女子蓮社，張玉濤還擔任該校佛學教授。<sup>④</sup>1930年2月8日，張蓮覺居士致函寶靜法師信函中說：“覺在澳功德林內，選擇信願女眾十餘人，組設佛學社專究法理，延高人講解，施以精密之訓練，期造成淨門之人材，業得正課生十餘人，旁聽生六十餘人。惟茲事體大，此後普求完善，冀成績之優良，覺責重材輕，冰淵時懼，所盼高賢碩德，錫以箴規，俱獲就正，乃承獎飾，彌覺感□交深，期之甚殷，荷以益重，只以不懈自策而已。蒙示上人亦在觀宗辦學，異地同趨，所謂道法有神，心心相印矣，幸甚慰甚。”<sup>⑤</sup>可見，觀本法師、張蓮覺居士他們的這些創舉，在香港、澳門推進現代新式的女眾佛教教育，極大地促進和提升了香港、澳門的女子佛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顯着澳門近代女性意識的崛起。現存反映功德林和女子佛學院創辦過程中的各種規章制度的〈功德林尼院肅眾清規〉及〈組織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等檔案史料，直觀地反映了民國時期港澳女子佛學教育以及性別平權思潮的實踐，印證了澳門在提升女性地位、推進佛教中國化以及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等方面的意義。

<sup>①</sup>譚世寶、胡慧明、王曉冉：〈澳門功德林創立之史蹟鉤沉〉，《文化雜誌》（澳門），總第73期，2009年，頁200。

<sup>②</sup>何建明：〈觀本與澳門近代禪淨佛教的傳入和發展〉，《文化雜誌》（澳門），總第38期，1999年，頁47。

<sup>③</sup>〈淨土聖賢——張何覺蓮（香港）〉，《雷音》（香港），總第131期，2007年，頁49。

<sup>④</sup>何建明：〈近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4期，1999年，頁31。

<sup>⑤</sup>〈各處致寶靜法師函：香港何蓮覺居士來函〉，《弘法社刊》（寧波），第14期，1930年，頁79。

清初至 20 世紀中葉，功德林經歷了特殊的歷史，同時也為澳門積累下寶貴而特殊的、凝聚着澳門地區特殊而鮮明的歷史記憶文獻資料。2023 年 5 月 24 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216 次執行局會議上，《澳門功德林寺檔案和手稿（1645 — 1980）》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這些文獻資料共有 2,300 多種、6,000 餘件，涉及功德林不同時期收藏的貝葉經、古籍、字畫、手稿、名人書信及老照片等，且有少量明末典籍。<sup>①</sup>其中不乏諸如梁啟超等著名歷史人物的親筆書信和官方函件。充分彰顯了澳門歷史文化的內涵，同時也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華佛教文化的展示，令澳門深厚文化底蘊在國際社會得到彰顯，尤其受到當代文化人士的關注和推崇。作為弘揚愛國主義和見證中華文明進步的歷史記憶，功德林的文獻遺產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及新時期的文化發展繁榮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推動世界穩定和諧發展方面具有特殊意義。世界記憶項目國際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副主席帕帕·摩瑪·迪奧普（Papa Momar Diop）對功德林檔案給予高度讚譽，稱其是罕見的涉及女性題材的記憶文獻，有助於喚起公眾對性別平等問題的關注。澳門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淵源、文化特徵與社會條件，在傳承中華文化的過程中，作出了無可替代的歷史貢獻。<sup>②</sup>

#### 四、抗戰期間澳門佛教界抗日救亡運動的“畫”外“音”

愛國愛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因為澳門是“中立區”，1938 年廣州淪陷後，內地難民不斷湧入澳門。澳門的寺院成為政府安置難民的主要場所。國難當頭，澳門佛教界又慈悲濟世，主動伸出援手，為因戰亂失學的難童開辦各種義學機構助難童就學讀書。“各地難民逃澳者日形擁擠，鏡湖醫院已收寄 600 餘人，再難容納，故警方特派員通告各大廟宇如觀音堂（即普濟禪院）已容萬餘人”。<sup>③</sup>

在普濟禪院各位法師的支持下，嶺南畫派知名畫家高劍父（1879 — 1951）帶領門下弟子關山月（1912 — 2000）、方人定、楊善深等人抵達澳門避難，在普濟禪院客居並沿用“春睡畫院”<sup>④</sup>進行繪畫創作。春睡畫院原是高劍父在廣州設立，由於避戰來到澳門普濟禪院並繼續授徒，延續“春睡畫院”的功能，助嶺南畫派在澳門發揚光大。高劍父，廣東番禺人，辛亥革命時期嶺南著名革命家和領導者，嶺南畫派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畫家、教育家。1906 年 7 月，在日本求學時成為中國同盟會會員。“高劍父早在民國初期就皈依佛門，1920 — 30 年代成為廣州地區著名的佛教居士組織楞嚴佛學社的負責人之一，由於

<sup>①</sup>楊開莉：〈澳門功德林寺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中國檔案》（北京），第 6 期，2023 年，頁 3。

<sup>②</sup>白照杰、栗翔宇：〈澳門功德林與“她”的世界記憶〉，《中國民族報》（北京），2023 年 7 月 7 日，頁 8，<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3070754-1.htm>，2024 年 5 月 10 日讀取。

<sup>③</sup>李棟財：〈愛國愛教樹典範：抗戰時期的澳門佛教界〉，《中國宗教》（北京），第 12 期，2019 年，頁 19。

<sup>④</sup>1920 年後，辛亥革命元老高劍父決意淡出政壇、潛心繪畫，旨在藝術領域發起“革命”。革命家黃興據諸葛亮詩“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給高劍父居處題額“春睡草堂”，“春睡畫院”遂得名，參見朱紹杰、任海虹：〈十香春睡啟畫派，嶺南重光在今朝〉，《羊城晚報》（廣州），2022 年 8 月 19 日，頁 A7。

保護過鼎湖山慶雲寺等因緣”，<sup>①</sup>高劍父眾弟子來澳門後借住在普濟禪院，他們用自己手中的畫筆，創作了大批抗戰題材的中國畫。並因此與澳門的佛教界結下了這段深厚的文化因緣，澳門也成為彼時中國南部地區的抗戰藝術創作中心。

當時的禪院住持慧因法師（1906－1979）利生濟世，富有愛國思想，積極支持高劍父、關山月師徒等人藝術創作，不僅為他們提供食宿，還資助他們辦“抗戰畫展”，進行文藝抗戰，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sup>②</sup>那時，關山月以教書為生，還在慧因法師的幫助下教繪畫班，白天寫生創作、籌備抗戰畫展。這兩年中，關山月創作的抗戰組畫真實地再現了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逃難人民所受戰亂之苦，一幅幅慘不忍睹的畫面震撼人心。這在後來的畫展中確實起到了宣傳抗日，鼓舞民眾，喚起港澳觀眾抗日救國的熱情。因抗戰畫展經費不足，沒有錢裝裱，慧因法師又援之以手，為關山月簽名擔保。確保在香港、澳門舉辦的抗戰畫展取得成功。<sup>③</sup>普濟禪院住持釋戒晟說，關山月不忘慧因法師的高風亮節，不忘這位出家人對抗戰畫展的慷慨資助，十分感恩，專門為慧因法師畫了張全身像以示感謝（圖2）。

圖2 慧因大師像（關山月繪並在畫前留影）



圖片來源：普濟禪院住持釋戒晟供圖。

<sup>①</sup>何建明：〈近四百年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略〉，《法音》（北京），第12期，1999年，頁29。1928年高劍父曾運用自己在國民政府的影響力，促使廣東省政府保存了鼎湖山慶雲寺免遭拆除。寺僧為紀念高劍父之義舉，在寺內設有“劍父堂”在上山道中設“護法亭”碑記此事。

<sup>②</sup>菩提心水：〈澳門佛教及其信仰特點〉，《法音》（北京），第12期，1999年，頁23。

<sup>③</sup>柳琴：〈關山月，民族氣節傳千秋〉，《百家湖》（南京），第7期，2015年，頁46－47。

圖3 高劍父於1938年10月春睡畫院手書“同仇敵愾”



圖片來源：傅玉蘭：《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02年，頁87。

關山月繼承了高劍父藝術救國的主張。1938年廣州淪陷後，關山月來到澳門，逃難途中觸目一片戰禍，目睹眾多苦難人民，從而畫下一系列抗戰畫。<sup>①</sup>《三灶島外所見》、《寇機去後》、《從城市撤退》、《中山難民》等抗戰畫作品有力地控訴了日寇的野蠻行為，用鮮活生動的藝術作品和無聲的吶喊，展示了藝術家對侵略者的痛斥，對國家興亡的關切，對同胞的憐憫，彰顯了藝術家們同仇敵愾的無畏精神和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大大激起了同胞們的抗戰熱忱，推動了澳門抗戰文化的發展，成為澳門佛教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縮影（圖3）。

抗戰期間，隨着竺摩法師、智圓法師、童真法師等內地的高僧相繼來澳門避難，對澳門佛教文化的傳播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的到來大大促進了澳門佛教文化的繁榮發展。智圓法師，浙江金華人，在杭州昭慶寺受戒於為僧，後到廣東弘道傳法。<sup>②</sup>“嗣以日寇南侵，城池蕪翳，灰劫推遷，烝民中露，餓莩盈郊；師乃耕耘自給，辦道不輟，如是者寒暑數易；後徒濠鏡，建智心佛堂為弘法道場，立蓮友互助社安者老弱”。<sup>③</sup>智圓法師避難澳門期間，為弘揚淨土法門，專門創建弘法道場智心堂，傳燈弘法。後來他又提倡發揚會員間的互助精神，創辦蓮友互助社，關心老弱相互幫扶，贏得澳門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和廣泛讚譽，成為澳門佛教淨土宗的創始人。<sup>④</sup>

竺摩法師（1913—2002），浙江樂清縣人，俗名陳德安，因在雁蕩山出家，便自號雁蕩山僧。18歲時，他在福建閩南佛學院接受系統佛學教育。21歲時受命為太虛大師侍者，隨太虛大師到粵港弘法。<sup>⑤</sup>來澳門前，竺摩法師就是愛國的積極分子，曾在浙江慈溪參加抗敵後援會為宣傳抗戰奔走呼號，在武漢參加僧伽救護隊抗日前線救護傷員。來澳門之後，竺摩法師以《覺音》月刊為宣傳陣地，以編輯和出版雜誌為紐帶，積極聯絡海內外愛國愛

<sup>①</sup>黃華明、郭麗欣：〈在山泉水清——“嶺南畫派”背景裏的高劍父與關山月〉，《美術學報》（廣州），第2期，2020年，頁90。

<sup>②</sup>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4期，1999年，頁48。

<sup>③</sup>盧逸岩：〈菩提禪院碑銘〉，1989年夏至立於澳門菩提禪院。

<sup>④</sup>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4期，1999年，頁48。

<sup>⑤</sup>陳其和、雷澤華：《傳統夕照：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東中國花鳥畫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05。

教的各方人士並團結起來，既弘揚佛法又與宣揚抗戰救國結合起來，《覺音》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覺音》月刊原由竺摩法師等人於香港創辦，但隨着竺摩法師來澳弘法，編纂中心也轉移到澳門功德林。竺摩法師不但自己動筆撰寫了大量時政評論，對兇殘的侵略者進行抨擊和鞭撻，喚起廣大民眾奮起抗戰。《覺音》還刊發大量宣傳抗日救亡的文章，積極宣傳佛教界抗日事跡，鼓勵和引導更多寺僧加入到抗日戰線中來，以此鼓舞信眾的抗戰熱情。成為華南地區的重要的宣傳抗戰刊物，僧俗兩眾讀者及海內外名流、高僧大德對刊物讚口不絕。<sup>①</sup>“生活在淪陷區裏的同胞們，希望能就實地的生活思想所得寫出富於正義感的文字，來感化人，來推行感化教育；獻身戰地做宣傳救護工作的同志們，亦希望能就實地生活所得寫些內容充實的稿子，使遠在海外的僑胞，可以從中探悉祖國的同胞們在劫難中所表現的大乘行者對於社會人類服務的精神”。<sup>②</sup>作為橋樑，《覺音》編輯出版、發行傳播，有效地加強了澳門佛教界與香港、內地佛教界之間的溝通交流，也為澳門近代佛教文化的傳承發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雖然澳葡當局宣稱澳門中立，但佛教界人士自發地積極參與到抗戰愛國的工作中來。“在難民不斷湧入澳門的同時，無量壽功德林等澳門寺院還設立施粥場，救助那些食不果腹的逃難同胞；……近年來又有學者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提出無量壽功德林可能還曾是‘抗戰秘密聯絡處’的說法”。<sup>③</sup>抗戰期間，不少佛學大師、文化大家因逃避戰亂而暫居功德林，因而令寺院收藏和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遺產，一方面說明了功德林在澳門的廣泛影響，另一方面亦反映了澳門在這特殊歷史時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澳門佛教界高度的抗日熱情和愛國覺悟。

## 五、澳門佛教界在與內地的交往中的文化擔當與使命傳承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葡澳當局的管控，設立種種嚴格限制，內地與澳門民眾不能自由往來。澳門與內地的佛教界也受此影響，交往基本上中斷。伴隨着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澳門居民與內地民眾的頻繁往來，佛教界人士的交流交往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澳門雖然曾經長期被葡澳政府管制，但澳門佛教界人士歷來都有愛國愛教的使命傳承，他們既是佛教徒，同時也是中國人，且依然通過實際行動弘法愛國，增進文化認同，加強使命傳承。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中華佛教文化的影響力一直不曾在澳門逝去。澳門佛教界人士“亦一直與全澳居民同甘共苦”，<sup>④</sup>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階段：

<sup>①</sup> 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55—56。

<sup>②</sup> 竺摩：〈關於本刊遷居及其他〉，《覺音》（澳門），第13期，1941年，頁2。

<sup>③</sup> 李棟財：〈愛國愛教樹典範：抗戰時期的澳門佛教界〉，《中國宗教》（北京），第12期，2019年，頁20。

<sup>④</sup> 〈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1期，2000年，頁16。

### （一）新中國成立前後內地高僧來澳弘法、辦刊辦學

應澳門僧人釋寬如、釋寬榮及善信李民欣居士之邀，1947年9月15日，禪宗泰斗虛雲大師赴澳門講經說法。<sup>①</sup>虛雲法師指出，人人具足佛性，他將佛性比作礦中真金，只有通過修行，才能淘沙見金，明心見性。他從“法即眾生心，眾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的佛教根本旨意出發，指明了上中下三乘修行的區別及修行方法。“論修行之方，機有上中下之異，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門不同。若為上機者，則為說大乘微妙法門；為中機者，為說出世解脫法門；為下機者，則為說解脫地獄、餓鬼、畜生三途之苦。佛雖說種種法門，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為根本”，<sup>②</sup>惟三歸五戒是導世良津，拔苦妙法。並勸信眾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此立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次說法，盛況空前，影響甚大。在平安戲院開示歸戒，皈依者眾多，成為近現代澳門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標誌性事件。1951年8月，繼《覺音》後，竺摩法師在澳門佛學社創刊《無盡燈》雜誌宣傳佛法，風行港澳及海外。<sup>③</sup>新中國成立後，作為澳門有影響的佛教組織還開辦學校為平民提供義務教育。1952年，澳門佛學社開辦佛教平民義學，學生達40餘人。澳門淨覺學社也於1953年秋創辦，招生40餘人。<sup>④</sup>

內地佛教高僧來澳弘法、辦刊辦學，為中華佛教文化在澳門的傳承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澳門佛教界不僅繼承了內地傳統中國佛教文化的佛學思想、修行方法、管理制度，還使澳門佛教文化與祖國內地佛教文化一脈相承，使中華傳統文化的特徵更加突顯，更加深入人心。

### （二）改革開放前後澳門佛教界主動赴內地訪問交流

隨着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澳門地區的佛教善信逐漸開始回到內地積極參與各地佛教盛事，並到祖國各處佛教名勝參觀遊覽。1979年，澳門菩提禪院住持智圓法師及健釗法師師徒二人參加由香港寶蓮禪寺組織佛教代表團到內地參觀訪問並進行佛教交流活動。<sup>⑤</sup>這也是1950年代以後，澳門佛教界首次赴內地進行佛教交流訪問活動。1982年，為迎請中國佛教協會贈送的《乾隆版大藏經》，香港寶蓮禪寺再次組織港澳佛教代表團到內地迎請。隨行的團員中有澳門佛教界的著名僧人智圓法師、健釗法師等十多位代表人士。<sup>⑥</sup>1987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後，澳門與內地佛教界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按下了快捷鍵。尤其是從澳門回內地受戒或者得法的僧人也與日俱增，兩地高僧大德相互主法或開光，佛教界之間的交流互訪日趨頻繁。

時任普濟禪院方丈機修法師（1927—2010）曾多次到內地訪問交流。他身兼澳門基

<sup>①</sup>楊開荊：〈探討觀本法師與嶺南地區首座女子佛學院創辦之歷程和影響〉，《文化雜誌》（澳門），總第115期，2022年，頁23。

<sup>②</sup>〈在澳門平安戲院開示歸戒〉，虛雲大師：《虛雲大師文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頁178—179。

<sup>③</sup>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113。

<sup>④</sup>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4期，1999年，頁46。

<sup>⑤</sup>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澳門），第4期，1999年，頁46。

<sup>⑥</sup>何建明：〈近四百年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略〉，《法音》（北京），第12期，1999年，頁30。

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作為澳門佛教界的唯一代表，49名觀禮團成員之一，曾於1987年赴京參加中葡澳門問題《聯合聲明》正式簽署儀式。<sup>①</sup>澳門佛教界與祖國內地佛教界之間加強友好往來的同時，兩地的佛教學術文化界間也進一步密切合作，相關學術會、研討會接連舉辦，一批反映澳門佛教研究的學術成果相繼發表問世。同時，“澳門佛教界也始終秉持着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對內地同胞給予深刻認同和深切關注，在內地積極開展賑災、扶貧、助學等公益項目，神州大地處處閃耀着澳門佛教界慈悲喜舍的身影”。<sup>②</sup>

### （三）澳門回歸前後澳門與內地共同舉辦佛教盛事

1993年3月31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章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了“宗教組織可依法開辦宗教院校和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宗教組織開辦的學校可以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教課程”等權利，為澳門居民宗教信仰自由及澳門佛教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1998年11月26日，作為港澳佛教界訪京團副團長，時任澳門佛教總會會長、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澳門菩提禪院住持健釗法師等率團訪問中國佛教協會。港澳佛教界訪京團一行受到親切友好接待。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刀述仁對於港澳佛教界多年來熱心支持祖國內地教育事業、捐資興建多所“希望工程”學校等眾多善舉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這是佛教慈悲濟世精神的體現，也是中國佛教協會一貫提倡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一大善舉。他希望大陸與港澳佛教界多多交往，相互學習，為增進彼此的友好關係、光大佛法作出貢獻”。<sup>③</sup>

1999年5月，澳門回歸前夕。92歲高齡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1907—2000）專門護送佛牙舍利赴港供奉。佛牙舍利在港供奉結束後，趙樸初應澳門佛教界邀請，到訪澳門佛教總會，受到澳門僧俗二眾的熱烈歡迎。<sup>④</sup>1999年8月，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一誠法師（1927—2017）擔任團長，帶領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專程赴澳門訪問。<sup>⑤</sup>澳門與內地佛教界的頻繁互訪，進一步增進兩地佛教界間的友好合作，深化和鞏固了雙方的關係。

隨着澳門回歸祖國日期的臨近，澳門佛教界人士愛國之情與日俱增。1999年11月16日是民族英雄林則徐巡閱澳門160周年紀念日。澳門蓮峰禪院專門舉辦了喜迎澳門回歸暨民族英雄林則徐巡閱澳門160周年紀念活動。蓮峰廟值理會主席龔樹根表示，“將秉承林公的愛國精神，為推動和維護祖國統一而努力”。<sup>⑥</sup>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的時刻，澳門佛教界於1999年12月5日在觀音堂舉行迎回歸祈福大會，祈祝澳門社會繁榮昌盛，居民和

<sup>①</sup>菩提心水：〈澳門佛教及其信仰特點〉，《法音》（北京），第12期，1999年，頁23。

<sup>②</sup>普正：〈同根同源共飲濠江水 法乳一脈合築同心圓——內地與澳門佛教界20年交流回顧〉，《中國宗教》（北京），第11期，2019年，頁27。

<sup>③</sup>〈港澳佛教界訪京團拜訪中國佛教協會〉，《法音》（北京），第12期，1998年，頁39。

<sup>④</sup>普正：〈同根同源共飲濠江水 法乳一脈合築同心圓——內地與澳門佛教界20年交流回顧〉，《中國宗教》（北京），第11期，2019年，頁25。

<sup>⑤</sup>普正：〈同根同源共飲濠江水 法乳一脈合築同心圓——內地與澳門佛教界20年交流回顧〉，《中國宗教》（北京），第11期，2019年，頁25—26。

<sup>⑥</sup>〈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1期，2000年，頁16。

樂安康。<sup>①</sup>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到祖國懷抱。澳門佛教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委員會於當日下午舉行祈福大會，來自內地港澳的9位法師與澳門佛教界10個團體代表同壇共同誦經，共同祈福，共同祝願澳門明天更美好。<sup>②</sup>

澳門回歸以來，佛教文化作為澳門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服務社區、造福市民等方面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2012年4月30日，澳門開埠四百多年來佛頂骨舍利首次在澳門供奉瞻禮。供奉期間有15萬人次前往瞻禮。澳門信眾與海內外佛教界人士紛紛歡喜讚歎。<sup>③</sup>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由澳門佛教（國際）聯合會、澳門佛教總會聯合主辦的2019世界佛教三大語系“頌華誕·慶回歸”澳門祈福大法會於2019年10月30日晚在澳門綜藝館舉行。作為澳門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場法會，來自世界近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佛教僧伽雲集澳門，與海內外佛教四眾弟子5,000餘人共同見證澳門的盛世繁華。<sup>④</sup>

歷年來，在特區政府支持下，本澳佛教團體先後舉辦了“千佛耀濠江——海內外佛界大供天祈福法會”<sup>⑤</sup>、“萬佛佑澳門——兩岸四地佛教界三大語系頌華誕慶回歸2009祈福大法會”<sup>⑥</sup>、“澳門佛教界慶祝建黨100周年書畫展”<sup>⑦</sup>等活動，眾多佛教高僧匯聚澳門，齊心為國家、為澳門特區的安定繁榮祈福。這不僅彰顯了文化歸屬，還飽含着內地佛教界以及內地人民對澳門同胞的深情厚誼，強化了澳門居民的國家認同。

## 六、結語

澳門佛教與祖國內地佛教法乳一脈，源遠流長。明清以來，受內地佛教思潮的影響，澳門佛教界具有鮮明的愛國色彩。

明末清初，澳門作為重要根據地，內地移民僧的到來掀起了澳門佛教的第一次高潮。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具有強烈的抗清思想的曹洞宗第二十九世石濂大汕重修擴建普濟禪院，不僅保留了中國傳統寺院的院落面貌，更為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雅士提供了容身之處，為佛教在澳門地區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著名高僧跡刪利用普濟禪院為據點進行秘密反清活動，反映出那個時代遺民僧敦尚節義的抗爭精神。清末民初，佛教界自我革新運動影響到了澳門。維新運動出身的觀本法師將內地佛教復興運動的許多新經驗傳播到澳門，給澳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功德林的創辦，繼承和發揚正跡刪的佛教

<sup>①</sup> 〈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1期，2000年，頁16。

<sup>②</sup> 〈邁向美好明天——澳門宗教界喜迎回歸〉，《中國宗教》（北京），第1期，2000年，頁17。

<sup>③</sup> 〈佛光照兩江：千載因緣之旅——佛頂骨舍利赴港澳供奉瞻禮紀行〉，《中國宗教》（北京），第5期，2012年，頁20。

<sup>④</sup> 〈佛教祈福法會頌華誕慶回歸〉，《澳門日報》（澳門），2019年10月31日。

<sup>⑤</sup> 劉衛國：〈千佛耀濠江——海內外佛教界祈福法會在澳門隆重舉行〉，《法音》（北京），第11期，2008年，頁63。

<sup>⑥</sup> 〈“萬佛佑澳門”兩岸四地三大語系高僧大德頌華誕慶回歸2009祈福大法會〉，《香港佛教》（香港），總第596期，2010年。

<sup>⑦</sup> 〈佛總賀百年黨慶書畫展開幕〉，《澳門日報》（澳門），2021年7月2日。

文化傳統。並使澳門佛教界也緊跟時代步伐，主動求變。對於澳門近代形態的淨土和禪佛教的發展，以及澳門近代形態的居士佛教、特別是女眾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抗戰期間，澳門佛教界伸出援手，澳門的寺院成為政府安置難民的主要場所。在時任普濟禪院住持慧因法師的積極支持下，高劍父、關山月師徒等人拿起畫筆進行文藝抗戰。竺摩法師則以《覺音》月刊為宣傳陣地，積極宣傳佛教界抗日事跡，以此鼓舞信眾的抗戰熱情，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充分體現了澳門佛教界高度的抗日熱情和愛國覺悟。新中國成立前後，內地佛教高僧來澳弘法、辦刊辦學，確保了澳門佛教界在佛學思想、修行方法、管理制度方面與祖國內地佛教文化一脈相承。

改革開放前後，澳門佛教界主動赴內地訪問交流，共同繁榮佛教文化。澳門回歸前後，澳門與內地進一步增進兩地佛教界間的友好合作，深化和鞏固了雙方的關係。使澳門佛教界深刻感受到了澳門與內地佛教界之間深厚的法誼。回歸 25 年來，澳門佛教界積極維護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精神，一直為增進澳門同胞國家認同、弘揚愛國愛教精神而不懈努力。歷史實踐證明，澳門佛教界具有愛國愛澳愛教的光榮傳統。為推動祖國內地和澳門地區佛教事業的合作與發展、佛教文化的共建與傳承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助力增強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家國情懷和愛國精神，鞏固愛國愛澳力量，為促進澳門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行穩致遠做出了積極貢獻。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李彤〕